

怀念东方学者W·爱伯哈德*

阿尔文·P·科恩

沃尔夫莱姆·爱伯哈德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在从事西亚、中亚和东亚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象他那样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是不多见的,因此他可以被毫不夸张地称作亚洲研究的真正“通才”。作为教师和学者,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许多地方的一代学生学者。甚至退休以后,他仍然热心于教学与著书立说,继续鼓舞激励着一代后学。

爱伯哈德教授的一生就象一个冒险故事^{*}。1909年3月17日他出生在德国的波特斯丹姆,他的父母则出生于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家庭。受家庭的影响,爱伯哈德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中国汉代的天文学与占星术,还同他的叔叔罗尔夫·缪勒合写了几篇有关汉代与三国时期天文学的论文。这些著述后来都收在爱伯哈德文集第四卷《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宇宙观》(1970a)中。在波特斯丹姆的维多利亚大学读预科时,爱伯哈德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两年英语。此后他的英语学习便中断了,直到1948年他到了美国,几星期后便不得不开始用英语上课。

1927年爱伯哈德进了柏林大学,开始潜心钻研古代汉语和社会人类学,另外也对满语、蒙古语、日语及梵语进行了研究。奥托·弗兰克和埃里克·豪尔都曾指导过他,1933年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由于柏林大学不能提供汉语口语的指导,爱伯哈德便同时暗地报名参加了柏林的东方语言研究班,跟从弗迪南德·D·莱森先生学习汉语。他所以这样保密,是因为他的古代汉语老师反对他学习口语,而研究班的老师们也不赞成他学习古代汉语。1929年爱伯哈德从研究班毕业后,便在莱森先生的指导下,在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工作。

1934年他初访中国,想为博物馆搜集一些民族志的实物。在浙江,爱伯哈德去了农村,他研究寺庙,还在曹松叶的帮助下搜集了一些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大部分后来收在了《中国东南部的民间叙事文学》(1966)一书中。随后不久,他来到北平,靠着朋友们的帮助,开始在北平国立大学、北平市立大学以及保定医学院教授德语和拉丁语。爱伯哈德和他的第一位妻子艾莉德(旧姓瑞莫)以及海尔穆特·威尔海姆一起住在北平。艾莉德有时也与丈夫合作著作,还帮助他校订和译成英语。1934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瑞纳也出世了。

1935年,爱伯哈德旅行穿越华北,旅行到了西安、华山、太原和大同的云岗石窟。在华山上他与道士们的交谈,成为他后来与海德·海默·莫里森合著《华山——中国西部的道教圣山》(1974)一书的基础。

回到德国后,他于1936—1937年担任莱比锡格莱西(Grassi)博物馆亚洲部的主任。

* 本文译自《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 1990年,第49辑, 125~133页。原题名为——《In Memoriam: 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

其间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不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1937年，在亚当·冯·塔罗特的帮助下，他获得了一项莫西·孟德尔颂奖学金（美国设），于是他买了一张环球旅行的车票，借此获准离开了德国。他周游的第一站是美国。在那里，他参观了芝加哥的菲尔德（Field）博物馆和堪萨斯市的尼尔松（Nelson）艺术馆，并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两次讲演。然后他打算去日本和中国。但由于当时的日本侵华战争，他最终只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收到安卡拉大学愿以教授职位相聘的协议书，于是在缺乏相应证件的情况下，他还是绕道去了土耳其，在那里与他的家人团聚了。从1937年到1948年，爱伯哈德在安卡拉大学教历史。他用土耳其语授课，用土耳其语和德语发表著述。这些著述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其中包括中国民俗学、通俗文学、历史、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地方文化、中国与中亚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耳其的历史、社会与大众文化等等。在他从教生涯的这段时期中，爱伯哈德为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他用土耳其语写成的《中国历史》出版了，以后又被译成德文、英文和法文。1977年，英文第四版出版。他的二儿子安内托，于1938年在安卡拉出世。

1948年，爱伯哈德获得了伯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为期一年的洛克菲勒补助金。第二年，该校又授予他为社会学系终身职教授。此后，爱伯哈德教过各种与西亚、中亚和东亚的社会与大众文化有关的课程，直到1976年他从伯克利退休为止。由于他对亚洲社会与文化的见多识广，东语系、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的学生们也常来听他的课，而他除了参加社会学系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之外，也经常在这些系的硕士、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会上担任委员。

在伯克利期间，爱伯哈德继续进行广泛的研究，同时发表大量的著述。他研究聚落形态；1951~1952年在土耳其搜集吟游故事；1956~1958年间及1977年，他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研究乡村发展问题；1958年他研究滇缅边界上的村庄；在阿富汗，他研究教育；在朝鲜和台湾，他研究商贩。1960年，他在艾莉德的协助下，研究了台湾的计划生育问题。他经常在台湾进行学术研究，并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授课。此外他还在法兰克福大学、海德伯格的汉学研究所以及慕尼黑的东亚研究所讲学。他还是《汉学与社会学》杂志以及《东亚文明：理解传统的新尝试》（维也纳）和《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台北）两套丛书的编委。后一套丛书是1970年他与娄子匡共同创办的。他还是一些很有声誉的学术团体的会员，例如美茵茨德国科学文学院、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土耳其历史学会以及美国民俗学会等。1954—1955年，他担任了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的主席。1980年朗德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退休以后，爱伯哈德仍然积极执着他的科研、旅行、演讲与教学计划。1989年8月15日，在长期患病之后，他在妻子艾琳（旧姓奥尼索格）的守护下，于家中去世。

爱伯哈德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面也很广。1931~1978年，他的著作书目共有650条之多，其中有书60本〔包括《中国历史》及其它著作的几种版本和（或）译本〕，论文185篇，还有许多摘要、书评、译文和学术短论。在他那六卷本文集中，从《亚洲的聚落与社会变迁》（1976b）到《中国平民的生活与思想》（1982b），其中既有旧著，也有新作。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和土耳其的民俗与民间生活，以及对地理的、民族的和社会意义上的中国“边缘人群”（marginal people）的持久兴趣，是从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明确开始发展的。他在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初期写作的论文表明，这一时期是他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社会的起源与发展、它的多民族构成及其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初始阶段。而出版于1942年的《中国边缘人

群的文化与聚落》和1943年的两卷本《中国古代的地方文化》则标志着他的这项研究达到了高峰。其中后者的第二卷被译成英文，1968年还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他后来的大量著述为这一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这些著述有：《对华北托巴王国的一次社会学考察》（“托巴王国”系由德语Toba-Reich译出——译者）（1949），《征服者与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强权》（1952b，1964年修订）、《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性》（1962），以及其文集第一卷《亚洲的聚落与社会变迁》（1967b）、第五卷《中国及其西邻》（1978），及《中国少数民族之今昔》（1982a）。

正是对中国和土耳其民俗与民间生活的浓厚兴趣，形成了爱伯哈德整个学术生涯的持久主题。他一生丰富的著述便是这一主题的体现。怀着对普通民众文化始终如一的兴趣，从1934年他在浙江进行最早的民间文学搜集起，经过对土耳其民间文学的搜集、对台湾大众文化的考察，到对古今资料的详细分析，这一系列努力使他写出了大量的著作、论文及书评，也使他因此成为中国大众文化诸多研究领域内的权威学者。1936年，他在《民俗学工作者协会通报》丛书（赫尔辛基）中发表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为把中国民间故事置于世界民间故事的系统研究之中提供了一个区域性的构架。《中国的神幻故事和民间故事》发表于1937年，系由他1936年用德文记录的搜集资料扩展而成，1965年修订后改为《中国的民间故事》。此后他还发表了许多搜集来的中国民间故事、歌曲、戏剧、小说和寓言。除了搜集民间文学资料外，爱伯哈德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分析中国民间故事与民间风俗的内涵、结构及其传承，后多收进其文集第二卷《中国民俗研究及其他》（1970b）及第三卷（原文此处作第四卷，似有误。今据文后注释改为第三卷——译者）、《中国的伦理与社会价值》（1971b）。他的社会学观点影响了他对民间故事传承的研究：他不仅关注故事讲述人、听众及讲述时的社会情境，还认为不同的性别、年龄及讲述人与听众之间的亲缘关系都会对故事内容产生明显的影响。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有力地体现在《台湾民间故事研究》（1970C）一书中。

爱伯哈德对民间文化的兴趣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大众信仰进行了广泛而富于权威性的研究。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罪与恶》（1967a）中，他经过分析认为，道德家们的宣传著作（善书）的广泛传布，是正统儒学之外中国伦理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又一来源。《中国的节日》（1952a；1972年修订，1977年译为俄文）是一本面向一般读者的、中国宗教节日概览性的书，但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他的这些研究影响了许多青年学者，他们创立了中国宗教研究会，还发行了期刊（1976）。

在民间文学、艺术和宗教领域内，反复出现符号的阐释问题。爱伯哈德也将他的注意力和博闻强记的阅读能力投向这一问题。从F·D·莱森的早期研究入手，他编出了《中国象征词典》，1983年在德国出版，并附有部分彩图。1984年该书被译成法语，1986年又译成英语（此二种无彩图）。按（该书1989年被译为中文，书名为《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建宪译——译者）。在书中，他除了对象征符号在历史、文字、信仰及隐喻中的隐含意义进行探究之外，还认为许多象征都含有性的意味，这是以前的研究从不曾阐明的。爱伯哈德对象征的最初兴趣在他1966~1978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梦境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其中包括一本小书《中国的梦及其阐释》（1971a）。

爱伯哈德有关中国民俗与民间生活研究的许多著作都被列入《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丛书（台北）出版。这套丛书也发表其他学者有关东亚、中亚和西亚的学术著作。在爱伯哈

德的鼓励下，丛书的出版单位——东方文化服务社（Oriental Cultural Service）将几种与中国民俗有关的、早已绝版却很有价值的专题研究丛书与搜集资料予以重印，例如《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及《国立北京大学及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丛书》。

1953年爱伯哈德与波特夫·耐力·鲍若诺夫合作，出版了《土耳其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为在世界大背景下进行土耳其民间故事的研究与比较提供了区域性构架。在此前后，他还发表了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其中包括《土耳其东南部的吟游故事》（1955）。虽然爱伯哈德在50年代以后似乎将大量精力用于探索中国民俗，他仍然激励着一代年青的土耳其民俗学者。

爱伯哈德受到过古典汉学以及现代社会学、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训练，这使他在工作中具有他人少有的优势。他能有效地研究古典文献中的问题，也能很好地进行现代田野作业和设计、实行调查计划，以及利用统计数据进行研究。他那似乎永远充沛的精力、组织材料上的高度技巧和一目十行的阅读能力，也是他学识渊博、文思泉涌的原因。在运用资料卡片、利用见缝插针法来贮存、补充资料（在计算机数据库尚未诞生之前）方面，他也是行家里手。他还非常乐于与别人分享他的研究资料。如果我打电话请教他某个问题，他总是请我稍候，然后几分钟内便念给我一个书单，告诉我主要的和次要的参考书，甚至与我的问题有关的页码。

爱伯哈德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和他同游台湾城市的大街小巷，常常使年龄只及他一半的人疲惫不堪，而他却余兴未尽。田野作业中，他总是极其敏锐地观察细节，而且他总是知道下一步去什么地方最合适。无论何时，只要他在台北，他总要去台湾电影（还据此写了一本书：《中国银幕：六十年代的港台电影》，出版于1972年）。他尤其爱去台北的一家剧院，还经常买第十三排的票，因为那家剧院十二排和十三排之间的空地足可以容纳下他六英尺高的身体和两条长腿。经过台北街上整整一天的实地考察之后，他总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家台湾风味的茶馆，可以去放松地喝茶、吃小吃。无论什么场合，他总保持着幽默而彬彬有礼的风度。

爱伯哈德还是一位令人鼓舞的老师。他的渊博学识和亲身经历常常给人一种略微奇特的幽默感。即使他常在早晨八点钟上课——他告诉我们，这是为了确保严谨的学风——他还是吸引了一批忠实的听众。他对自己的时间、学识以及那有名的卡片中的资料都非常慷慨大方。在学生的论文答辩会上，他提出的问题虽难，但往往很中肯、很公正。他的准时守约也使他赢得了声誉。他能准时地将学生的论文初稿交还作者，并提出详细的批评意见。甚至当他在巴基斯坦进行田野调查时，他也很快地将原稿及打印好的详细批评意见一起交还作者（他的字确实有点难认）。他还有意识地培养青年学者。他到我校作学术报告时，报告结束后他留在教室里和学生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记下他们提出的问题，答应日后把答案寄来——他果然信守诺言。几天后，学生们就收到了他的信和有关资料。

对很多幸运的学生来说，爱伯哈德教授远远不只是一位令人奋进的老师，他还是一位知心朋友，准备随时聆听我们的苦衷，并满怀同情地给我们以指导，帮助我们渡过人生的这一逆境。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无比的荣幸。

爱伯哈德的学术业绩将在他的丰富著述中得到永生。他的仁爱、友善和灵慧将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引用书目”略

杨利慧 译